

# 清初满汉冲突与北方区域文化之变迁

高翔

本文探讨的是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大一统”专制王朝对我国北方区域文化之影响。区域文化，也就是具有相对独立个性特征与完整内涵的地区性文化，就本文而言，主要指以儒学为核心，在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汉族农耕文化，清朝以前，其范围向北大致延伸至长城以南；二是活跃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三是东北地区兼畜牧、狩猎、采集、农耕等多种生产方式的混合型地区文化，因采猎是其代表性特征，故亦可称之为采猎文化。在历史上，区域文化往往是民族的代名词，这是因为“民族”一词和强调体质差异的“种族”不一样，它本身就是文化的概念，正是基于不同的区域环境、生活方式、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才形成不同的民族，而不同民族间相互争夺、贸易、和亲，也就构成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竞争与交流。在中国北方，游牧、采猎与农耕三大区域文化彼此间基于深层结构的交融与冲突，曾深刻影响着王朝盛衰，世代隆替，长城南北、黄河两岸，曾经历了多少次民族征杀的风雨冲刷！而1644年清军入关，将这一古老、沉重的历史话题又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历史似乎在惊人地重复。然而，结论不同了，大清帝国的创立，最终改变了三者之间的传统关系，中国北方的文化分布因之发生巨大变化。让我们首先追溯清朝以前三大区域文化之历史。

## 一、三大区域文化之形成及其关系

谈及三大区域文化，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农耕与游牧，二者在风土人情，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很早以前即已为人注目，如春秋时代有“华夷之辨”，秦汉时期有“引弓”、“冠带”之分，十三世纪道教大师邱处机更以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他对长城南北的不同感受：“北渡野狐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从此隔绝矣。”<sup>①</sup>唐宋以前，农耕与游牧之间的冲突与交流，构成了北方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中国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在夏朝即具雏型，《论语·宪问》云：“禹稷耕稼而有天下”，《汉书·食货志》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榷”。<sup>②</sup>降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以农业著称的周人更将农耕文化的影响扩大到长江中游，形成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波及吴楚的农耕文化圈，在其内部通过宗法制的分封建立了相对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井田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产方式。<sup>③</sup>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分裂割据，但作为各国共同存在基础的农耕文明却在竞争与冲突中获得长足进步：铁器广泛使用，粮食产量提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秦汉时，随着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中原农耕不但在政治上高度统一，而且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手段，开始在意识形态，道德风范等各个方面以一体化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北方游牧文化区出现的年代，迄今尚无确切资料，若据《史记·匈奴传》推断，则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以前，蒙古高原就已经成为游牧民族生息繁衍之地，战国秦汉时，匈奴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主体，约在秦末汉初（公元前209年以后），单于冒顿歼灭东胡，西击月氏，南

并楼烦，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第一次在今天的蒙古高原建立了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从历史的角度看，冒顿统一漠北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使中国在具有两种不同性质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长期对峙的政权组织，即“南有大汉，北有强胡”。④尽管以后的中原和塞北都有过人世代谢，聚散离合，尽管元朝曾有过短暂的大统一，但总的说来，在清朝入关以前，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从未得到根本改变。

政权并存只是文化并存的特殊表现形式，而一个政权对相邻文化的态度也往往取决于它所在文化之结构状况。由于游牧民族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这就使它的经济生活受着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条件的严重制约，“他们虽然成功地征服了这种可怕的环境，这个环境却也在暗中把他变成了奴隶”。⑤因牲畜食品不如粮食谷物易于保存，所以游牧社会往往缺乏农耕民族那种顽强的抗灾能力，当灾荒发生时，饥饿、死亡便接踵而至，象汉地节二年“匈奴饥，人民畜产死者十之六七”，⑥元定宗三年，“是岁大旱……牛十死八九，民不聊生”。⑦每当灾荒发生，游牧民族都通过战争或和平的手段从南方农耕区运走大批粮食和衣物。避开灾害因素不谈，单纯游牧本身也很难满足因人口增加而不断扩大的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于是粮食就成为肉类的必要补充，而茶叶等必需品也须从农耕地区获得，由此形成北方游牧对南方农耕的经济依附，这种依附促使它主动寻求文化的接触与交流，而游牧民族在军事上的优势则保证了这种主动性的充分实现。

在历史上，游牧民族以行国著称，勇猛强悍，“风驰电卷，不恒其陈，以弓矢为爪牙，以甲冑为常服，”其战斗力远较处于分散定居状态的城国——农耕民族为强。⑧《旧唐书》载突厥毗伽可汗欲仿汉人建立城堡、寺观，为臣僚阻止，其辞云：“突厥人户寡少，不敌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改变旧俗，一朝失利，必将为唐兵所并，且寺观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争强之道也，不可置也。”⑨正是这种强大的军事力量，使游牧民族一次次如汹涌狂潮，奔腾南下，把对农耕文化的经济依附变为军事掠夺，把以冲突、劫掠为重要内容的文化接触带限制在长城以南的农耕文化圈内，从而保持它在文化关系中的进攻姿态。笔者曾据《史记》、《汉书》、《匈奴历史年表》等资料统计，在西汉二百余年中，匈奴大举进入长城以内就占三十九年，几乎每隔五、六年就有大的战事，有时甚至一年数度入边，严重者逼近汉朝都城，至于长城以南的河套地区，这时已数被匈奴征占，以致视其得失以为强弱。尽管武帝时汉朝曾北击匈奴，为自己赢得近百年的和平，但一旦匈奴元气恢复，又屡屡南略。降及魏晋南北朝以及宋元时期，北方农耕区更陷于“中原板荡，夷狄交侵”的混乱局面。⑩

大约在公元十世纪以后，农耕区又多了一个新的强劲对手，这就是相继崛起于东北的契丹和女真。东北辽阔的区域、复杂的气候、与农耕、游牧相邻的特殊文化环境，使这个地区的民族往往兼具行国、城国之长，既勇武善战，又或多或少接受农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游牧经济的脆弱性，故一旦兴起，便势不可挡。宋神宗对此曾深有感触，他说：契丹之所以难治，“有城国，有行国，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矣，比之汉唐最为强盛”，哀叹绝无“扑灭之理”，“但用此以为外惧则可”，大宋王朝最终在东北另一更为强悍的民族——女真的打击下，“中原横溃”，退守南方⑪。

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主动进逼，必然给定居的中原农耕居民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文化上的强烈优越感与军事上的相对软弱结合起来，就迫使他们采取一种极为矛盾的居高临下的防御姿态，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说：“（匈奴）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

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如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以礼让，羈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人御蛮夷之常道”，其言寓意只有一个：守而不攻，备而不进。后世蔡邕的一段话可以为其注脚：“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殊异俗也，苟无蹙国内侮之患，则可矣，岂与虫蝶校寇，计事往来哉”？<sup>⑫</sup>事实上，古代的长城正是统治者“别内外”的文化优越感与“设险以固其国”这一防御需要的综合体现。然而，这道天险并不牢固，从秦朝到明末，北方民族的铁骑曾多少次突破边墙，驰骋于中原？以明长城为例，尽管许多地段已较秦时大为南移，仍屡屡为蒙古跨越，故清圣祖康熙帝对修筑长城不以为然，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sup>⑬</sup>

清朝以前，中原与北方牧猎文化的接触地带主要在农区而不是塞外，充分反映了牧猎在文化关系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在具体历史进程中，这就表现为牧猎在中原地区大量扩散。我们看到在清朝以前的千余年中，北方农区居民的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体融入众多民族的新的开放型民族共同体——“汉人”，如魏晋南北朝时迁入中原的匈奴、乌丸、丁零，以及宋元时期南迁的契丹、女真、蒙古等，大多转向农耕，改用汉姓，成为汉人的一部分，故清初顾炎武感叹“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今代山东氏族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sup>⑭</sup>南迁民族的汉化证明了“征服者被征服”这一历史规律，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北方汉人包容了大量少数民族成分，故其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和以前相对单纯的华夏相比，已经有了明显差异。在语言上，汉语大量吸收少数民族语言，形成“北杂夷虏”情形，在生活方式上，不少汉人出现少数民族化倾向，如北齐高欢一族，“累世北迁，故习其俗，遂同鲜卑”。<sup>⑮</sup>尤其是经元朝统治，蒙古对中原的影响甚为深远，不少汉人改用“胡服”、“胡语”、“胡姓”，到十五世纪中叶，“鞑装”仍较唐服为盛。<sup>⑯</sup>牧猎文化，一方面削弱了中原地区的儒学传统，使其“经术浸微”，<sup>⑰</sup>另一方面，又为北方汉人注入了朴实强悍的独特气质，夏竦《论幽燕诸州》云：“幽燕山后诸州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敦尚气节，可以义动。”《新安县志》称：“其人刚介尚朴略，而少文华，纯厚之风相沿成俗”，都反映了牧猎风情对北方汉人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总是向最适合于自己存在与发展的地区转移。北方牧猎民族的南下，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扩散，迫使传统的农耕文化向南迁移。西周对江汉的经营、春秋战国时吴楚的发展，都是农耕文化向南推进的产物。魏晋以后，“中原丧乱”，“北人避胡多在南”，农耕经济重心逐渐移到了南方，出现“赋出天下而江南占十九”的情形。<sup>⑱</sup>两宋以后，南方学术文教超过了北方，反映在科举上，就是“地气南移”，“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sup>⑲</sup>清初，玉夫之站在传统儒学立场，抚今追昔，对数千年南北文化变迁感慨不已，他说：“三代以上，华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河北者，自黄帝诛蚩尤以来，尧舜禹敷文教以熏陶之，遂为诸夏之冠冕，垂之数千年而遗风泯矣。”<sup>⑳</sup>“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藪，齐鲁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驽戾者，十九而抱禽兽心矣。……今且两粤滇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可问，地气南徙，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sup>㉑</sup>

## 二、清初满汉文化冲突与康熙的历史抉择

1644年清军入关，再次拉开了农耕文化与牧猎文化冲突的序幕。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岁月，面临着新的选择。

自从唐末以来，崛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屡屡成为中原王朝的强劲对手，彼此间兵燹迭起，

“遍野横尸”。直到蒙古铁骑南下，双方的争斗方暂告平息，明朝建立后，东北各族成为大明管辖下的臣民。然而，好景不长。十五世纪以后，女真又趋强盛，十七世纪，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东北形势骤然剧变，关外许多由汉人开辟的农耕区被后金占领，大批士绅惨遭屠戮。<sup>②②</sup>皇太极即位后，更对明朝实行“残毁”政策，纵兵入关，“暇则一年两征，不暇亦一年一征”，“令兵纵略”，“蹂躏其粮草牲畜财物，任我兵所取而回”，<sup>②③</sup>通过大肆抢劫、杀戮以削弱明朝，“坐待其毙”。这样，汉族与女真间的矛盾逐渐由关外转入内地，到顺治元年，清军入关，满汉民族矛盾更在中原地区全面爆发。

本文一开始就指出：“民族”一词首先是文化的概念，民族矛盾的实质或焦点，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立。导致清初民族矛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性原因是：一些满洲贵族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在祖宗“淳朴旧制”驱使下，力图将自己的文化模式强加给汉人，力图按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行使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从而使以士人队伍为核心的汉民族产生了“用夷变夏”、“天崩地解”的强烈文化危机感，不得不起而抗争，形成两个民族的尖锐对立。当时，这种文化冲突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在生产方式上，关外农奴制与关内租佃制之间的矛盾。从顺治元年起，清廷在顺天、保定等地圈占大批土地，建立起大大小小的旗地官庄。圈地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民族掠夺行为，它是摧毁被圈占地区固有的自然经济、租佃关系，代之以起，以实行关外的农奴制和残存奴隶制的方式进行的，其直接后果是使大批汉族农民不但丧失土地和财产，而且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农奴或奴隶。因而圈地政策及其推行，带有浓郁民族文化征服色彩——即改变被征服者的存在方式，所以遭到汉族上下一致的强烈反对。如果说，大批百姓逃亡（“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许多人不肯屈辱，愤而自尽（“八旗奴婢，每岁报部自尽者，不下二千人”），仅仅反映了倍受奴役的汉族民众的反抗，<sup>②④</sup>那么许多未受圈地之害的汉族官僚的抗议则充分说明圈地与反圈地的斗争是两种文化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态上的尖锐对立，而不单纯是部分汉人与满洲贵族、旗人的利益冲突。如顺治时，魏瑄、赵开心等汉官面对圈地既存事实，要求修改《逃人法》，对窝主从轻论处，结果被指责为“偏护汉人，欲令满洲困苦，谋国不忠”，遭致重处。<sup>②⑤</sup>魏裔介更站在儒家仁爱立场，直言不讳地指责《逃人法》太严，并对旗地上严酷的农奴制提出尖锐批评，他对顺治说：立逃人峻法，“下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寻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皇上爱民如子，各旗亦宜仰体圣意，遇下以恩。彼虽奴隶，岂无恋主之心，而纷纷鸟兽窜，胡为也”？<sup>②⑥</sup>

第二，在生活方式上，满洲习俗与汉族传统的矛盾。比较典型的是围绕衣冠发饰的斗争。清廷强迫汉族改变自己的衣冠发饰，诚然反映了满洲贵族用清制取代明制，通过衣冠发饰的“归一”强化其统治的政治意图，然而，作为生活方式重要内容的衣冠发饰，从来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象征。正因为如此，剃发令才使广大汉人产生了强烈的被征服感。人们在真挚庄严的民族情感驱使下，不分男女老少，无论贫富贵贱，纷纷起而抗争，“士兵和百姓都拿起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以致大学士陈名夏有“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之语。<sup>②⑦</sup>如果说两种文化在衣冠发饰上的冲突以清廷的军事镇压获得解决，那么在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如婚丧、节庆）的对立却长期存在，不时爆发。以丧葬为例，满族传统丧仪至为简单，象努尔哈赤头天去世，第二天即棺殓出宫，予以安葬。入关后，丧事渐趋隆重，但仍不可和主张“事死如事生”的汉人相比。一些满洲官员不但不遵循儒家有关规定，而且违反“居丧作乐筵宴之禁”，故屡遭汉官攻讦，象康熙二十五年，礼部侍郎

徐乾学就指责满洲在京官员“颇沿旧习”，“百日释服”，“举殡演剧”，“为非礼之尤”。<sup>⑳</sup>

第三，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上，满族“家法”、“祖制”等习惯势力与儒家学说的对立。清初，对刚刚从东北迁居中原的清廷来说，它正经历着由地方政权向全国政权的转变，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其中，用何种社会意识重新组织社会精神生活，以何种方式行使统治权力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前途与命运。从表面上看，早在入关前，清廷就宣布要“以文教治世”，进入北京，又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其实，口号、仪式并不等于历史实际，人们的社会本质只有通过人们的客观历史活动才能得到证明。在入关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批满洲官僚在“本朝家法”、“祖宗成宪”影响下，力图将努尔哈赤，皇太极时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关外传统思想原封不动地搬到关内，即“率复祖制，咸复旧章”，<sup>㉑</sup>而这必然遭到汉族士人以及一些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满族官僚的反对，这就导致了两种文化在意识形态、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的剧烈冲突，这种冲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诸王议政传统与儒家推崇君权的矛盾；重骑射、尚勇武与以文教治天下的矛盾；满族传统信仰与隆重师儒、独尊儒术的矛盾；满洲贵族垄断政治权力与重用经术人才，礼遇汉族士人的矛盾。这些矛盾与满洲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交织一起，从而使清初的政坛呈现异常复杂的情形。顺治帝“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渐有更张”的罪己诏，内三院的旋复旋废，康熙初进士录取额的暴减、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的裁撤，等等，都是满汉文化冲突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一些学者指出：政策变幻不定，反复无常是清初政治的一大特点，其实，这一特点正反映了两种文化在价值观念的较深层面竞争、冲突之尖锐与复杂。

应该说：清初满汉民族矛盾实质上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汉族农耕文化和形成于东北地区的满族传统价值观念的对立。正因为这一矛盾具有深刻而且敏感和文化的内涵，顾炎武才感到明清鼎革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有别于一姓兴亡的“亡国”，哀叹“仁义充塞”，“天下将亡”，进而发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感人号召。<sup>㉒</sup>也正因为这种冲突激发了汉族人民数千年积淀而成的深沉真挚的民族情感，故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前仆后继，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出反抗民族征服的悲壮战歌。

纵观清初中国形势可以发现：满汉文化冲突能否得到解决，不但决定了清朝统治者能否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北方三大区域文化未来发展趋向，尤其决定了中原和蒙古游牧地区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从顺治开始，一批跻身清廷的汉族官僚即孜孜不倦地向满洲贵族、旗人子弟传播儒家学说，象徐元文为国子监祭酒，督促旗人子弟学习经典，“规条严肃，满洲子弟不率教者，必加挞责”。<sup>㉓</sup>当然，他们最集中的关注对象还是专制皇帝，因为他们深切认识到：国家“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皇上之一身”，故促使皇上尽心儒学“为当今第一要务”。<sup>㉔</sup>

由于顺治去世较早，且笃信佛教，故终其一朝，儒学影响并不明显。继他之后的康熙却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康熙八年，清除鳌拜集团，不久即下令进呈经筵日讲仪注，十年复设起居注官，清代帝王培养教育制度至此稳定下来。和保守满洲贵族不同，康熙不主张“率祖制，复旧章”，而是强调要继承“满洲礼法”，他不反对儒家学说，而是强调不习“汉俗”、不染“汉习”（即汉人中的恶劣品性、风俗）。二十六年，他在谈到对皇太子的培养时，曾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满汉文化的看法：

“朕谨识祖宗家法，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可少废。故令皇太子、皇子等课以诗书，兼令娴习骑射。即如八旗以次行猎，诚恐满洲武备渐弛，为国家善后之策。朕若为一人行乐，何

不躬率遑往？近见众人及诸王以下其心皆不愿行猎，朕未尝不闻，但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sup>③③</sup>

这段表面上义正辞严，要严满汉之别的上谕有两点是耐人寻味的。第一，它把满汉之间的民族界线缩小到了最低限度，即骑射与否，并强调“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这实质上等于承认满族全面接受儒家文化这一未来的历史事实；第二，把“祖宗家法”概括为“文武要务并行”，宣布培养皇太子、皇子“讲肄、骑射不可少废”，这实质上等于宣布将儒家思想作为君主、贵族的精神支柱，以骑射作为维护统治、加强国家统一的暴力基础，并赋予二者最高的法律权威即“祖宗家法”。康熙这一思想表明：他不但把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观，而且把它作为行使统治的指导思想，满洲传统道德意识正在被儒家纲常伦理所取代。<sup>③④</sup>

在清初满汉文化剧烈冲突的特殊社会条件下，处于政治中枢的专制皇帝选择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力图付诸实践，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不但在理论上比较彻底地解决了清朝政治发展方向问题，而且为其他满洲贵族、群众树立了无可非议的榜样，许多人效法皇帝，“留心学问”，儒学逐渐成为满汉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满族中出现了一批享有盛誉的文人学士，象饶余亲王阿巴泰曾孙文昭辞爵读书，“才名藉甚”，大学士明珠之子揆叙“所学不但超出满洲之中，即汉人中亦少”<sup>③⑤</sup>。随之而来，统治集团的素质有了明显改善，中央政权的儒学化程度加深，一些落后的政策措施得到纠正，这在客观上不能不使汉族士民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满汉民族关系趋于融洽，中原农耕与东北采猎的冲突趋于缓和，比较典型的如：许多过去拒不仕清的“隐逸之士”至是也纷纷出山，“争趋鞶鞶，惟恐不与”，真正出现了“一队夷齐下首阳”的新景象。<sup>③⑥</sup>

中国的儒家，历来是国家统一的积极鼓吹者，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其后盾。我们注意到：满洲的崛起，是与其崇尚勇武的英雄传统分不开的。康熙接受儒学，并没有放弃尚武精神，相反，将其视为“祖宗家法”大加推崇，以致“勋旧子弟莫不熟习弓马”，内外慑服，“皇武威棱，震濯中外”。<sup>③⑦</sup>清廷正是以儒学为旗帜，依靠这支勇武善战的军队，创立一个气派恢弘包容众多民族的庞大帝国，时人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合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北，声教所被，莫不尊亲”。<sup>③⑧</sup>这样，北方三大区域文化就前所未有地处于一个统一、和平的政治环境之中。

### 三、“大一统”与北方区域文化

和以前各代相比，清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革，这就是“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作为传统政治家们潜心追求的政治目标，“大一统”历来被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sup>③⑨</sup>追溯其源，语出《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大一统”在政治实践中具有多重含义，如中央集权、文化专制等，然而其最主要的思想内容则是国家统一，即使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六合之内，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莫不受德，各安其宇”。<sup>④⑩</sup>反观历史，清朝以前，历代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大一统”，最主要的问题是代表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农耕文化的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没有得到解决，象号称繁荣的汉朝文景之世，中原统治者也不得不致书匈奴单于：“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许以金帛丝絮以求安好<sup>①</sup>。元朝有过短暂的大统一，但为时不到百年即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明朝，又不得不修长城以御蒙古，降至后期，更陷于与后金连绵不绝的战火之中。清朝不同，它处理民族问题比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要高明，都要成功。它依靠强大的武力，通过灵活的政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第一次将农耕、游牧、采猎各族置于中央政府强有力的统一管理之下，长城，从此失去了向北防御的意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统一、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和平相处、共求发展。

政治是文化的产物，但政治并不等于文化，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它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引导、甚至规范文化的发展方向。正是清朝“大一统”政治环境，使战争不再成为文化交流的特殊杠杆。三大区域文化之关系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初步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新型机制，而一旦这一机制获得完善与巩固，“大一统”就不再单纯是一种偶然的政治现象，而是植根于历史，尤其是文化发展之必须。

自从皇太极开始，清朝就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限定各部游牧范围，“既定界，越者坐侵犯之罪，往来驻牧，各会齐移动，毋少参差”。<sup>②</sup>这一政策减少了蒙古各部因争夺牲畜、牧场而引起的纷争，但其根本目的却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即将游牧各部固定在各自狭小的区域内，对其分而治之，以防止蒙古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央政权相抗衡。与此同时，清廷对蒙古“慑之以兵威，怀之以德”，软硬兼施，使其成为清廷忠诚可靠的“塞外屏藩”。<sup>③</sup>

然而，划定各部游牧地界，在客观上却使本来脆弱的游牧经济更加脆弱。因为在限定地界的情况下，即使畜牧产品不足，也不能任意扩大草场，发展生产，甚至在遇到灾荒时，也不能随意迁往水草茂盛之地，只能坐等中央政府的赈济。象康熙二十七年，在独石口外的浩齐特部遭灾，牲畜大量死亡，蒙人生计窘迫，清廷只好发拜察储粟相赈济，又命给银。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又救济土谢图汗部四万余人。五十四年、五十五年，蒙古大雪，不少部落全靠赈济存活。当时动用大批积贮，以唐三营储粟赈济阿巴噶部、阿巴哈纳尔部、浩齐特部，以呼坦和朔储粟赈济乌喇特部、茂明安部，用张家口储粟并帑十万，赈济苏尼特部，“自台吉下六万四千九百余丁遍赈之”，此外还遣官赈济鄂尔多斯七千九百余户，三万一千余丁，赈阿坝垓部穷丁十岁以上者每口给乳牛一头，母羊三只，无牲畜台吉每人多给母羊三只。甚至对噶尔丹，清廷也曾拨给“白金千两”，以救济其部众。清人说“蒙古人之衣食等一切物品大半购自内地”，由此可见，游牧民族对农业生活资料的依赖大大加强了。然而，单靠中央赈济毕竟不是久远之计，在游牧经济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对许多蒙古王公和民众来说，接受农耕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选择。<sup>④</sup>

清初的东北地区，情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作为一个开放的民族共同体，女真各部来源、分布、生活方式并非完全一致。嘉靖人魏焕《皇明九边考》记载说：“建北毛怜则渤海大氏遗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自长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真，完颜之后，金之遗也。俗尚耕稼，妇女以金珠为饰，倚山作寨，聚其所亲居之。居黑龙江者，曰生女真，其俗略同山寨，数与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自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一种曰女真野人，又一种曰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诸夷皆善驰射”。<sup>⑤</sup>随着时间推移，女真社会在向前发展。象元代，东北女真大多过着“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生活，到明初则多兼农牧采猎为一体，进而“皆有室庐”，逐步定居下来，而且农耕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有加大之势。十七世纪前期，随着发展水平最高的建州女真的崛起，尤其是在后金攻占辽沈以后，农耕就日益为统治者所重视，原因很简单：在传统社会，农业是唯一能向政权提供

稳定的生活资料的产业部门。故努尔哈赤说：“我国素无积储，虽得人畜何以为生？不论不足以养所得人畜，即本国之民且待毙矣”，提出要“务农事，裕积贮”。继他为汗的皇太极更明确宣布：“田畴农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将发展农业作为基本国策。<sup>④⑥</sup>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引进汉族先进耕作技术，充分利用其大量熟练劳动力。故后金政权曾采取措施，鼓励东北地区的汉人尽心农事，如天聪四年春播之时，皇太极“命汉民乘时耕种，给以牛具，复榜示归顺各屯，令各安心农业”。<sup>④⑦</sup>清军入关后，东北成为统治全国的“根本之地”，其经济能否得到发展，更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又为汉民出关开发东北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清朝前期，传统农耕文化区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问题。随着战乱结束、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人口急剧增加，逐渐形成人多地少的新局面。早在康熙五十年前后，不少地区就出现无荒可垦，“内地实无闲处”的窘迫情形，并已开始影响到人民生活，康熙说：“生齿日繁，田土仍旧，……因人民滋息愈盛之故，虽遇丰年，米价亦不甚减”。<sup>④⑧</sup>乾嘉之时，人口压力更大，昔日“一人衣食之需，今日且供一二十人之用”，“生之者寡，食之者众”。<sup>④⑨</sup>作为农耕中心的南方，人多地少矛盾尤其突出，“不但汉民生齿日众，即苗民丁口亦渐繁庶，所种山土不能宽然有余”。<sup>⑤⑩</sup>象浙江杭州府于潜县，人均耕地只有六分四厘，处于中等水平的湖南长沙府善化县人均耕地也刚过一亩，“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南部中国，经农耕文化上千年扩散，开发之后，其潜力已呈耗竭之势。<sup>⑤⑪</sup>

文化总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扩散是文化保持自身活力的基本手段。人多地少，必然加大传统农耕向外扩张的动力，即通过寻找新的土地资源以缓解内部人口压力。在南方已经没有什么发展余地的情况下，土地辽阔的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就成为它非常自然的选择，而这正迎合了当时蒙古和东北地区对农耕的需求，“大一统”政治环境则为农耕北上提供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 四、农耕北上与文化变迁

清代，中国区域文化分布的最大特点是：农耕文化北上东进，使传统的蒙古游牧区第一次出现大片农耕带，而昔日以采猎为特征的东北，农业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耕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获得了加强，北方满蒙汉民族开始了全方位的大融合。

对曾经入主中原的蒙古贵族来说，农耕并非是完全陌生的生产方式，早在元代，他们就有人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并曾做出过发展农业的尝试。<sup>⑤⑫</sup>明代，许多蒙古贵族曾将掳掠、招募入蒙的汉人安插各地，从事农业，“居屋佃作，号曰板升”。板升，即汉语百姓的蒙古译音。只不过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塞外农耕未能发展起来。

清代，农耕与游牧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客观现实，终于推动农耕北上，将两种文化之接触带从长城以南推向长城以北，而这一变化是以内地汉人大量迁徙到蒙古草原为标志的，“明末鼎革之际，籍隸山陝之官紳，起兵抗拒清兵，兵败后无所为，则挈家至塞外避祸，荒山僻野，耕稼其中”。<sup>⑤⑬</sup>到康熙时，随着内地土地紧张，塞外遂成北方各省百姓的重要去处，四十六年，巡幸塞外的康熙帝亲眼看见喀喇沁三旗“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之多”。<sup>⑤⑭</sup>乾隆时，尽管清廷表面上禁止百姓移居蒙古，规定：“山海关、喜峰口以及九处关门，皆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sup>⑤⑮</sup>但实际上采取的是放任自流政策，时仅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即不下数十万户。原因很简单：蒙古已经成为吸引内地过剩人口的

重要场所，“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不得不“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sup>⑤⑥</sup>

汉民的大量迁入，使蒙古地区的人口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象热河迤北，清初并无汉人，到乾隆四十九年，汉民增至五十五万人，至道光五年，增至八十八万，许多地区，汉人人数超过蒙古人，象克什克腾旗在光绪初年，汉族移民、流浪者达七万余人，而蒙古人仅三千人。是时长城沿边，已经形成蒙汉杂处的半农半牧地区。至于内蒙东南，到十九世纪，就出现“开垦地亩较多，牧场较少”的新局面。<sup>⑤⑦</sup>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管理，清廷在汉民聚居区逐步建立厅县等汉族行政机构。顺康时，设有通判、同知等职，雍正时，在漠南蒙古设归化、张家口、八沟等十余厅，到乾隆时，更在喀喇沁所部垦地设平泉州，在土默特所部垦地置朝阳县，又设热河府，下辖一州五县。光绪时，置昌图府。府、州、县的设立，表明蒙古新增农耕地已经获得清廷的承认，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

至于东北地区，农业的历史更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可能就出现过原始农业，中原农耕文化，也曾多次向该地扩散、辐射，自明朝设辽东都司以后，仅辽河流域开垦土地就达三百余万亩。不过，终明一朝，东北农业总的说来还不算发达。到了清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统治者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曾采取措施，招关内农民前来垦荒。如辽东地区规定：能招民开垦者，可以官至知县或守备，在吉林、黑龙江地区，也设置官庄屯田。随之而来，东北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吸引了大量关内流民，移民东北者源源不断。康熙初，清廷曾设柳条边限制百姓出入，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农民，迫于生计，仍纷纷冲破清朝的阻力，冒禁开垦，“不但不肯回籍，抑且呼朋引类，日积日多”。<sup>⑤⑧</sup>东北旗人虽然占有大量土地，因不谙耕作，于是“雇觅长工，助其力穡”，地方官对封禁政策也大多阳奉阴违，“总以该流民等业已聚族相安，骤难驱逐为辞，仍予入册安插”，“漫不查禁，致出关人数增至数万，尚然不知”。<sup>⑤⑨</sup>至乾隆后期，内地人多地少矛盾更趋尖锐，清廷不得不改变封禁传统，允许百姓自由出入，五十七年，乾隆降旨：“盛京等处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可藉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矣”。<sup>⑥⑩</sup>内地汉民的大量迁入，促成了东北经济面貌的改变，耕地面积急剧增加。象吉林耕地，雍正末年民地为270余顷，旗地为8400余顷，到乾隆后期，民地即增至16,000余顷，旗地也增至24,300余顷。这些新垦土地主要实行的是中原地区的租佃制，而不是东北地区传统的奴隶制或农奴制。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商业城镇开始出现，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是颇有代表性的城市，象吉林本为船厂，到康熙时却“中土流人千余家，西关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亦边外一都会也”。<sup>⑥⑪</sup>至于宁古塔，“有东西大街，人于此开店贸易，从此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sup>⑥⑫</sup>流民的迁入，使东北地区在经济上和内地稳固地联为一片，出现了一体化趋势。

人是文化的载体，人们走到那里，就将自己的文化带到那里。清朝“大一统”形势下，内地百姓的北上与东进，将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带到了蒙古与东北，并和当地土著文化交融汇合，形成了满蒙汉三大民族在较深层次上的融合。

和以往游牧风气影响中原不同，清代，农耕文化处于积极进取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原地区生产方式、社会习俗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极为明显。当时，农耕生产技术传入蒙古社会，一些蒙古民众开始放弃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学习农业生产，即所谓“蒙古佃贫民，种田得租多，即渐罢游牧，相将艺黍禾”。<sup>⑥⑬</sup>在察哈尔蒙古人中，更出现了各种定居的小村落。归化土默特“居民大多在农村或乡村种田，过着定居的生活”，<sup>⑥⑭</sup>而热河地区的蒙古则农牧并举，“农

作非蒙古本业，今承平日外，所至多依山为田，既播种则四出游牧射猎，秋获乃归，耕耨之术皆所不讲，俗云靠天田”。在牧民稠密的塔尔巴哈台的土尔扈特及在伊犁的厄鲁特人和察哈尔人，也开始出现农耕趋向。<sup>⑥</sup>在日常生活方面，一些蒙古人也改变了以前单纯食肉的习惯，“近以汉人北耕，亦甘食五谷”。<sup>⑦</sup>一些汉文典籍，尤其是著名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蒙文，在蒙古人中广为流传，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等颇受蒙古民众喜爱。嘉道年间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除译文外，还写了四十篇回批，对该书提出了不少创见，反映出精深的文学素养。在一些地区，随着蒙汉接触增加，“由酬酢而渐通婚姻，因语言而兼习文字”，<sup>⑧</sup>许多蒙古人民学习汉语、汉文。如土默特人“多肄汉书，凡有公文案件报部则用清文，咨各札萨克则用蒙文，移道厅则用汉文，近岁大半以汉文往复，不为禁例所拘”。<sup>⑨</sup>至于蒙古王公贵族，因交往需要，学习汉文者更多。随之而来，蒙古民族中出现了一批兼通汉蒙、颇负声望的学者。如克什克腾旗的拉西彭楚克利用辽金元三史和《通鉴纲目》，编写成了《大元盛朝史》。额尔德特氏和瑛著《续水经》，弥补了《水经》和《水经注》关于东北、西北和西藏等地区记载的缺漏。和瑛之子璧昌著有《守边辑要》、重孙锡珍著有《喀尔喀日记》，锡珍之姊锡婉长于文学、书法。额尔德特氏一族，可以说是清代蒙古贵族学习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故史称该族“自祖父以来，文风甚盛”，名扬一时。<sup>⑩</sup>至于自幼即熟读宋儒之书，推崇理学的著名蒙古族政治家松筠，更以其忠正刚直，深受时人称赞，史载其居伊犁时，“朝中之士君子皆翘首以望其归也”。<sup>⑪</sup>

在东北地区，中原农耕文化逐渐为广大满族群众所接受，进而居于主导地位。应该说，清廷自康熙以后，虽然允许入关满族学习儒学，但却力图在关外为满族传统文化保留一块绿洲，筑柳条边即主要源于这一考虑。雍正曾说：“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惟赖乌喇、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满洲本习耳，今若崇尚文艺，则子弟之稍颖悟者俱专意于读书，不留心武备矣”。故要求宁古塔等处及黑龙江将军“但务守满洲本习，不可稍有疑贰”。<sup>⑫</sup>然而，封闭与隔绝并不符合文化之本性，文化间的相互交融因源于其内部固有之动力而具有客观必然性。在东北地区，满汉民族朝夕相处，相对先进的汉族文明不能不对满族群众产生深远影响。象本与汉俗大相径庭的丧礼“近亦同化，极难分判”，只是在个别地方，“微见其异致耳”。<sup>⑬</sup>时有不少改用汉姓者，乾隆二十五年，清廷曾降旨指责其事，称：“八旗满洲、蒙古皆有姓氏，乃历年既久，多有弃置本姓沿用汉习者”，“今若不整饬，因循日久，必各将本姓遗忘，不复有知者”。<sup>⑭</sup>学习汉语和儒学的人也渐趋增加，象吉林“本满洲故里”，“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其四品以上任职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sup>⑮</sup>甚至连清廷千方百计保持满洲传统的宁古塔，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宁古塔，尚淳实，耕作之余，尤好射猎。近年汉字事件日增，竟谈文墨”。<sup>⑯</sup>更有一些崇尚儒学的满洲学者（如完颜谏给阿什坦）将《大学》、《中庸》等经典译成满文，供普通旗人学习，收到良好效果。康熙曾感叹说：“因有满书，满洲武官翻阅史书，通达义理者甚多，汉人武官中读书者甚少，竟有一字不识者”。<sup>⑰</sup>满族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在分析清代满蒙汉文化融合时，应当特别指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不同，融合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或同化，而是双向的，是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清朝历史情形正是如此。在汉族移民改变蒙古与东北地区文化面貌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打上了当地固有文明之烙印。象在蒙古地区，尽管蒙汉通婚为清廷法令所禁，但仍有不少汉族移民“依蒙旗，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sup>⑱</sup>许多汉民根据蒙古地区

实际情况，既从事农耕，也兼营畜牧。不错，当时蒙古人有供奉关帝者，但也有不少汉人信奉喇嘛，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蒙古化现象。秋浦先生介绍说：“我在蒙古西部地区接触了一些蒙古化了的汉人，由于他们在当地居于少数，他们在蒙古人的包围中，住的是蒙古包，穿的是蒙古服，吃的是蒙古饭，讲的是蒙古话，和蒙古人完全一样，也自称为蒙古人，可是他们的祖先却是汉人”。<sup>⑧</sup>至于清代的满洲，更是兼容满蒙汉的多元民族共同体。当时满、蒙、汉各旗之间并无严格界限，改旗之事时有发生，吴振棫说：“国初各部落及汉人之归附者，分隶满、蒙、汉八旗，亦时有改易。如华善本隶汉军正白旗，其先苏完人，因改入满洲籍，此汉军改满洲也；和济格尔本蒙古乌鲁木齐人，后隶正白旗汉军，遂为何氏，此蒙古改汉军也……”。<sup>⑨</sup>更重要的是，清初大批汉人投充满洲，被作为满洲佐领下人，成为满洲成员，这批人一方面加速了满族的汉化，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满洲传统。在满族文化发祥地东北，满族文化之影响尤为明显，史书称：奉省习俗，“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现有习俗，或源于满，或移植于汉”，而外省汉人，来到东北以后，往往“再世以后，与满洲同化矣”。<sup>⑩</sup>正是这种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交融，使蒙古和东北地区，既接受汉族农耕文化，又保持自己独有的地区特色，在“大一统”环境中，兼收并蓄，以丰富多彩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 结语

1644年清军入关，使汉族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采猎文化之间的传统矛盾又重新暴露出来，满汉民族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历史似乎正上演着惊人相似的一幕。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汉族民众的反抗，儒学的传播，康熙对理学的推崇与吸收，都促使清廷采取措施，调整统治政策。在“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可少废”方针指导下，大清帝国逐渐形成空前规模的“大一统”局面。在全新的政治环境中，北方农耕、游牧、采猎三大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大转变，战争不再成为文化交流的特殊杠杆，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成为新型文化关系的重要特征。正是在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力推动下，随着大批汉族百姓北上蒙古，东进奉天，中原农耕文化全方位地推向传统的游牧区和采猎区，满、蒙、汉三大民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水乳交融，塞北和中原，东北和内地出现了浑然一体的新趋势。区域文化的变迁，使加强国家统一，不再单纯是一种政治的需要，而且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

①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②《汉书》卷24《食货志》。

③《诗·北山》。

④⑤《汉书》卷94《匈奴传》上。

⑥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部《文明的成长》。

⑦《元史》卷2《定宗纪》。

⑧《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

⑨《旧唐书》卷115《突厥传》下。

⑩岳飞《五岳祠盟记》。

⑪宋王某《道山清话》。

⑫《后汉书》卷90《鲜卑传》。

- ⑬王先谦《东华录》康熙 58,《康熙实录》卷 151。
- ⑭参阅顾炎武《日知录·胡服》、《皇明经世文编》卷 73。
- ⑮《北史》卷 6《神武记》。
- ⑯《明英宗实录》正统 7 年 12 月。
- ⑰江少虞《宋朝史实类苑》卷 30《词翰书籍》。
- ⑱参阅《世说新语·政事篇》、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 ⑲王士禛《香祖笔记》卷 8。
- ⑳王夫之《读通鉴论》卷 12、卷 26。
- ㉑王夫之《思问录·外篇》。
- ㉒参阅《清太宗实录》卷 37。
- ㉓《明清史料》甲编第 1 本第 64 页,李民奚辑《满洲闻见录》第 44 页、《清太宗实录》卷 14。
- ㉔《顺治实录》卷 26,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 2。
- ㉕《顺治实录》卷 90。
- ㉖《国朝先正事略》卷 3 魏裔介。
- ㉗参阅卫匡国《鞑靼战纪》、《清史稿》卷 245 陈名夏。
- ㉘《国朝先正事略》卷 9 徐乾学。
- ㉙《康熙实录》卷 2。
- ㉚参阅顾炎武《日知录》卷 13。
- ㉛《碑传集》卷 12 徐元文行状。
- ㉜《碑传集》卷 11 魏象枢事状。
- ㉝《康熙起居注》第 2 册第 1639 页。
- ㉞参阅白晋《康熙皇帝》第 28 页。
- ㉟《清史稿》卷 484 文昭,《康熙起居注》第 3 册第 2351 页。
- ㊱王应奎《柳南随笔》卷 4、高翔《论清初理学的政治影响》、《清史研究》93 年第 3 期。
- ㊲昭木哇《嘯亭杂录》卷 1,《郎潜纪闻》二笔卷 9。
- 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雍正起居注》7 年 6 月,《雍正实录》卷 83。
- ㊴《前汉书》卷 56 董仲舒。
- ㊵《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
- ㊶《汉书》卷 4《孝文帝纪》、《史记》卷 10《孝文本纪》。
- ㊷《满文国史档案选译》、《历史档案》82 年第 4 期。
- ㊸《顺治实录》卷 119。
- ㊹康熙 20 年以后,清廷几乎年年救济蒙古。参阅《清史稿》卷 519、520,《康熙实录》卷 137,《皇朝藩部要略》卷 3、卷 4。
- ㊺魏焕《皇明九边考》卷 2。
- ㊻参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3,《清太宗实录》卷 13。
- ㊼《清太宗实录》卷 16。
- ㊽《康熙起居注》第 3 册第 2269、2439 页。
- ㊾《乾隆实录》卷 1441、1370。
- ㊿《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13 册第 90 页。
- ①嘉庆《于潜县志》卷 11,《善化县志》卷 6,《康熙实录》卷 1244。
- ②参阅《元史》卷 26《仁宗三》。
- ③《绥远通志稿》。
- ④《康熙实录》卷 230。

- 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58。
- ⑥《乾隆实录》卷 604。
- ⑦《嘉庆实录》卷 229。
- ⑧《道光实录》卷 250。
- ⑨《乾隆实录》卷 257。
- ⑩《乾隆上谕档》57 年 11 月 18 日。
- ⑪参阅杨宾《柳边纪略》卷 3。
- ⑫参阅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 ⑬《热河志》卷 92。
- ⑭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156 页。
- ⑮同治《畿辅通志》卷 71《舆地》，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以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 69 页。
- ⑯光绪《土默特旗志》卷 8《风俗》。
- ⑰《东三省政略》蒙务下。
- ⑱《土默特旗志》卷 4《法守》。
- ⑲《荣府家乘》卷 23。
- ⑳《啸亭杂录》卷 10。
- ㉑《雍正实录》卷 22。
- ㉒光绪《吉林通志》，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第 249 页。
- ㉓奕庚《管见所及》，佳梦轩丛著本。
- ㉔萨英额《吉林外记》卷 1。
- ㉕《吉林外记》卷 8。
- ㉖《康熙起居注》第 2 册第 1474 页。
- ㉗民国《朝阳县志》卷 26《种族》。
- ㉘《世界民族是一个极为广阔的领域》，《西北民族研究》88 年第 2 期。
- ㉙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 1。
- ㉚《奉天通志》。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第 30、31 页。